

欧盟国家对外贸易与移民问题研究^{*}

朱 农 骆许蓓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欧盟国家内部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及经济不稳定性的增加, 失业率上升, 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 外来移民逐渐被视为一种负担, 由此导致欧盟国家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由以往的鼓励吸收移民转为采取各种政策限制外来移民。

赫克歇尔- 俄林 (Heckscher - Orlin, 以下简称 H - O) 的理论认为, 贸易与迁移之间具有替代性,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提出贸易自由化可作为一项减轻外来移民压力的政策药方, 即主张发达国家通过发展双边贸易、增加资本流动、扩大技术协作等方式来帮助移民输出国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高生活水平, 以降低移民外迁的倾向, 最终达到缓解接收国移民压力的目的。但也有些学者认为贸易与迁移之间并不一定是替代关系, 无论通过贸易理论推演还是通过实际情况验证, 都有可能得出贸易与迁移之间存在互补性的结论。而且对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迁移群体, 政策的效用也不尽相同, 欧洲经济一体化又使欧盟国家内部和外部迁移的情况更加复杂。因此, 贸易自由化与国际迁移的关系是当前国际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和实例回顾, 探讨贸易与移民之间替代或互补的关系; 分析外来移民对欧盟国家社会经济的影响; 研究欧盟国家控制移民政策的有效性。

一、替代还是互补: 贸易与移民的关系的理论解释

传统的 H - O 理论认为, 商品贸易来源于不同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 而要素的流动将促进国家之间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从而减少商品贸易。也就是说, 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是互相替代的。然而, 要使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存在替代性的结论成立, 必须严格符合以下假设条件: (1) 两种要素、两种产品、两个国家 ($2 \times 2 \times 2$) 模型; (2) 完全竞争; (3) 两国生产技术相同; (4) 规模经济不变。在满足以上假设条件之下, 设 A 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 从而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 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B 国资本相对充裕, 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 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果假设在国际间劳动力能自由流动, 则 B 国相对

较高的工资水平将吸引 A 国劳动力流入, 资本和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使 B 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扩张, 这将使 B 国同时减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供给和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而这一劳动力的流动对 A 国的影响正好相反。同理, 如果假设资本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则其流动对两国贸易量的影响也是负向的。因而, 要素的流动, 会在 A、B 两国同时造成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的减少, 从而造成两国间贸易的减少, 由此可以推导出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相互替代的结论。

然而, 历史数据、实证研究等都表明, 在现实中, 要素流动 (本文重点讨论劳动力流动, 即移民) 和商品贸易并不存在严格的此消彼涨关系, 相反, 贸易量的增加往往还伴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也就是说,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要素流动与商品流动之间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事实上, H - O 定理只是一个基本的理论, 其结论的成立依赖于理想的假设前提。但如果我们放松 H - O 理论的某些假设的限制, 则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综合近年来的理论研究, 贸易和移民的关系可能有以下几种理论解释:

第一, 修正的 H - O 模型 (Modified H - O model)。在 H - O 理论的假设中, “两国技术相同” 隐含了对要素密集程度逆转可能性的排除。而在现实中, 这种逆转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不同商品在不同的国家, 要素密集程度排序不同, 则商品贸易的增加可能并不导致要素价格的国际均等化。例如, A、B 两国相对稀缺的资源不同, 而其出口产品都密集使用该国的稀缺要素, 贸易的增加, 将进一步扩大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异, 促进要素的国际流动。在这种情况下, 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是互补的。

第二, 李嘉图模型 (Ricardian model)。李嘉图模型也是针对 H - O 理论假设中“两国技术相同” 的假设提出修正。假设资本充裕的 A 国同时又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拥有较高的技术, 也就是说在 A 国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力的生产率较高, 则 A 国的劳动力工资也应当比较高。要素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使 B 国劳动力流往 A 国, 从而使 A 国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例增加, 在雷宾斯基效应的作用下, A 国更专业化

* 本文系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欧盟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与国际移民关系》的研究成果。

于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A 国劳动力工资的增加,使 A、B 两国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B 国将有更多的劳动力流向 A 国。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也是互补的。

第三,特定要素模型(Specific-factors model)。特定要素模型在 H-O 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性。假设各种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程度不一样: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于各个产业,称为流动要素;而资本和土地则只能应用于特定产业,称为特定要素。假设 A 国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使该国进口替代行业面临的需求下降。进口替代行业面临的需求下降,必然导致该行业对要素需求的下降。由于该行业为劳动力密集型,则其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将相对大于对资本等其他要素需求的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名义工资的下降。假设出口商品价格不变,则以出口商品价格衡量的实际工资必然下降。但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幅度大于名义工资下降的幅度,因而,以进口商品价格衡量的实际工资就会上升。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方向依赖于消费品中进口商品所占的比重:如果这一比重大,则实际工资可能上升,商品贸易促进 B 国劳动力向 A 国的流动;反之,商品贸易减少劳动力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确定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的关系,其替代或互补的关系还决定于其他因素。

第四,资金限制模型(Financial-constraint model)。H-O 理论忽略了要素流动的成本,实际上,移民这一行为本身是需要一定成本的。在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工资一般相对较低,工人的储蓄也就受到相当的限制,从而也就限制了迁移能力。贸易自由化一般会使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出口更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这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工资的增长或就业机会的增加,从而将增加工人家庭的储蓄。储蓄的增加,有可能弱化移民行为的资金约束,提高移民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使潜在的移民成为现实的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贸易促进移民,两者是互补的。

第五,“新”贸易理论(“New”trade theory)。H-O 理论假设“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不变”,认为要素的流动将促进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竞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由于偶然或特定的原因,某一国专业化于生产规模经济递增的产品,工资相对于另一国家为高,导致劳动力的流入;而劳动力的流入又使该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更为显著。在这种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导致劳动力的流动,两者呈互补关系。

此外,克鲁格曼(Krugman,1991)认为,贸易自由化和国际移民均对生产的集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生产集聚又进一步推动贸易和移民的增长。一方面,规模经济递增产业的存在,促进要素集中于某一国家(A 国),以求获得更高的要素生产率。然而,生产集中于 A 国,必将促使该国的工资水平

上升。另一方面,将产品销往其他地区也会有一定的运输成本。这种工资水平的提高和运输成本的存在,构成了生产集中化的障碍。贸易自由化使运输成本降低,首先,这使得将产品销往其他地区的成本下降,促进生产的进一步集中化,导致生产要素流向 A 国;其后,生产要素的流入又会进一步扩大该国的市场需求,促使更多的厂商在 A 国生产……这种相互强化关系的存在,理论上最终会使劳动力高度集中于 A 国——贸易自由化和移民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上述各种理论模型,在各自的假设条件下,对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关系的分析都是合理的,其结论的不同来源于假设前提的不同。要讨论两国贸易与移民的关系,必须具体结合国家的特征,研究模型的适用范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

二、鼓励还是限制: 欧盟国家贸易与移民的实例分析

受国际人权法律保护,劳动力的移出一般不受限制,因此,从控制移民的意义上来说,移民接收国扮演着主要角色。下文主要从移民接收国的角度讨论外来移民对福利的影响,分析欧盟国家贸易和移民之间的关系。

(一) 欧盟国家移民形势的演变

20 世纪 50-60 年代,劳动力的流动与贸易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关贸总协定的创立,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不断被削减,贸易自由化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欧洲内部来看,“欧洲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扩大,极大地推动了成员国间的相互贸易和对外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成员国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异,降低了欧共体内部迁移的动力。但是,来自成员国外的移民却有增无减。在这期间,欧洲劳动力市场上求大于供,对低层次工人的需求尤其迫切,大多数国家对外来移民都持欢迎态度,认为外来移民能较好地满足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工资差距和移民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南、北非和南欧大量的劳动力向中欧和北欧流动。然而,到了 1973-1974 年,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率上升,致使迁移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内部来看,失业率的普遍上升,增加了异地就业的难度,两地收入的差距不足以补偿迁移的机会成本。社会保障(特别是失业保险)的发展,一方面延长了寻找工作的时间,提高了失业率;另一方面对迁移者在居住时间上的限制则降低了异地就业的倾向。此外,妇女社会参与率和失业率的上升,增加了家庭迁移的难度。从外部来看,就在这个时期,欧洲各移民接收国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积极鼓励,接收外来移民变成限制移民。尤其是欧盟各国,限制移民的政策更是日趋严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的前提下,国际移民的增长速度却大大放缓,与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90 年代初期,欧盟国家外来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重与 80 年代初期相比,并没有明显增长,这一比重在有些国家(如法国)还出现下降。

导致移民接收国政府对外来移民态度产生变化的原因,首先在于接收国经济增长的减慢,从而增加了公众对失业问题的关注。公众认为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技术劳动力)的增多将拉大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工资水平的差距并加剧失业问题。其次,接收国的舆论认为,长期来看,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多会改变接收国的社会结构,而且外来移民对公共产品的过度消费将影响本地居民的利益,故而主张限制外来移民。

然而,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不能推出外来移民的增长必然增加接收国失业率的结论。我们认为,有必要详细分析移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从社会福利变化的角度研究贸易和移民的关系。

(二) 外来移民对欧盟国家社会、经济的影响

1995年的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 1995)以“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为题,讨论了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对富国和穷国经济的影响。无论对于移民接收国还是移民输出国,迁移都会对社会、经济发生深刻的影响。

一般而言,移民输出国主要是劳动力充裕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其国内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劳动力输出能减轻国内就业的压力,在社会、经济中扮演了“减震器”的角色。此外,移民的汇款还能增加国内的外汇储备。因此,劳动力输出在迁出国通常是受到鼓励的。

从移民接收国来看,情况则相对复杂。对于欧盟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外来移民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正向影响来看,外来移民为接收国提供了大量的非技术工人,满足了这些国家对低层次劳动力的需求。20世纪50-60年代,欧洲劳动力市场普遍趋紧,大批外来的“蓝领”工人为移民接收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有效地应付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外来移民还具有缓解人口老化、降低扶养比例,减轻社会保障负担等积极作用。外来移民的负面影响,从接收国公众的观点来看,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对短期而言,外来移民挤占了本地工人的就业岗位(尤其是低技能的岗位),使失业率上升;低素质的外来劳动力的大量迁入,会降低边际劳动收益(工资)与边际资本收益的比率,拉大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从长期来看,外来移民的增加会改变社会和人口的结构,从而导致“社会资本”的下降。

然而,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理论上分析,外来移民的增加都不一定会导致上述负面影响,一方面,外来移民必然增加接收国失业率的情况,一般只发生在接收国劳动力市场工资严重刚性的情况下。如果接收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具有一定弹性,由于非技术工人正是接收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则其流入不一定增加该国的失业率,反而可能更好地与其他要素相组合,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外来移民对接收国社会福利影响程度的大小更是因接收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接收国

政府的移民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下文将详细论述不同情况下外来移民对接收国社会福利的影响。

首先,假定移民接收国资本相对充裕,作为固定要素,资本不能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而外来移民主要是非技术劳动力的流入。接收国劳动力市场有两种可能:(1)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工资由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决定;(2)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性: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前者提供“好”工作及高于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效率工资;后者提供“坏”工作,提供等于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工资。假设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均处于出清状态,即不存在非自愿的失业。从接收国对待移民的态度而言,主要有三种情况:(1)完全不歧视外来移民,对本土公民和外来移民一视同仁(这种方式被称为melting - pot,以下简称M - P)。(2)法律上明令区分本土公民和外来移民的就业权利,规定只有在不能找到同等条件的本土公民的情况下才能雇佣外来移民。由于正规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因而,外来移民事实上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移民被称为“客座工人(guest - worker,以下简称G - W)”。(3)法律上不歧视外来移民,但雇主认为外来移民在辞工率高和社会关系少等方面不如本地公民,从而正规部门较少雇佣外来移民。这实际上是介于以上两种方式之间的一种情况。下文主要分析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在接收国对待移民的不同态度下,外来移民对接收国福利的影响,而将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接收国对外来移民完全不歧视的状况作为理论上的对比基准。

分析社会福利的变化有两种标准。一种是经典的效用主义理论的标准,即以接收国的平均收入来衡量外来移民对该国社会福利的影响,而不考虑因为收入的不均等分配而造成的公平问题,也就是说,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分析。事实上,接收国之所以吸引外来移民,原因在于其劳动力(主要是非技术劳动力)的相对比例较低而相对工资较高,适量外来移民的流入有利于提高其他要素(如资本)的生产率。所以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分析,外来移民有利于增加该国的社会福利。另一种标准则着眼于收入分配的均等,也就是从“公平”的角度分析。兼顾公平的原则,则不能仅仅以收入平均值的变化来衡量外来移民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由于外来移民主要是非技术劳动力,而非技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必然拉大接收国的工资差距,从“公平”的意义上看,不利于该国社会福利的提高。

在M - P情况下,外来移民的流入,增加劳动力供给,在资本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相对增加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降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也就是说降低工资。由于对外来移民和对本土公民一视同仁,外来移民对本土公民在正规部门就业率的影响不能确定,因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不能确定其对接收国福利的影响。

在G - W情况下,外来移民的就业范围基本被限制于低工资的非正规部门。外来移民的流入只增加非正规部门的劳

动力供给而不增加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非正规部门工资水平的下降必然大于正规部门,从而拉大收入的差距。但与此同时,正规部门工资的下降增加了该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而由于正规部门的工作基本都由本土公民从事,移民的流入必然也增加本土公民在正规部门的就业率。也就是说,外来移民的流入同时从两个不同方向影响接收国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而最终影响则取决于这两种作用的相对大小。但与M-P情况相比,G-W方式无疑对本土公民更为有利。

因此,从移民接收国社会福利的观点来看,G-W体系总体上要优于M-P体系。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逆转,由鼓励移民变为限制移民,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大量移民工人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返回其移民输出国,而是通过取得长期居住权转化为当地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则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逐渐消失,也就是说由G-W方式变成了M-P方式,从而对本土公民产生不利的影响。

贸易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起什么作用?贸易保护一般是着眼于扶持国内的进口替代产业(主要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保证收入分布的均匀,即以“公平”为目的。但贸易保护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效率”上的损失。缪勒(Muller,1999)指出,社会福利与关税税率之间是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凸二次曲线的关系,在关税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后,贸易保护对福利的正向作用会为“效率成本”所抵消。而且,政府或公众对“公平”的关注程度越低,贸易保护政策的作用就越小。

移民接收国对外来移民持抵制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大量的外来移民冲击了传统文化,弱化接收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社会结构中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的总和,具体来说,即社会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语言、文化等,社会资本通过密切家庭或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增强家庭或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和信任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效用和产出。从长期来看,大量的外来移民的流入会增加接收国社会的异质性,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导致本土“过度外国化(over-foreignization)”,降低接收国的社会资本,从而降低本土公民的福利。尤其是当以客座工人身份移入的外来移民选择永久居留于接收国而不返回迁出国时,外来移民对接收国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和持久。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从积极欢迎到严格限制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与短期移民永久化现象的增加有关。因此,为弥补社会资本方面的损失,接收国通过征收适量的“移民税”来控制移民量,提高社会福利。这里的“征税”可以有不同形式,如限制迁入量,分割国内劳动力市场等。在对移民的迁入量实行控制情况下,移民接收国和移民输出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福利都可能得到提高。

贸易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又起什么作用?根据希弗

(Schiff,1998)的研究,移民接收国关税的提高有可能有利于移民输出国的整体福利;但不利于移民接收国。而移民输出国关税的提高对双方都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希弗的结论是:人的流动不同于商品和劳务的流动,因为迁移会带来某些副作用。在自由迁移下,自由贸易应是一种优化选择;但在自由贸易下,自由迁移却不能导致最好的结果。移民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移民接收国(发达国家)则应对移民实行一定的限制。

对于不同的移民接收国,贸易与移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温德埃伯等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个案,研究了欧盟东扩后的来自东欧的移民对接收国的影响(Winter-Ebmer,1999)。他考察了来自东欧的移民、来自东欧的进口、接收国对东欧的出口及接收国国内产出等因素对接收国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在奥地利,外来移民对总就业的增长无影响,但对奥地利籍的工人就业增长有负作用,也就是说外来移民挤占了本地工人的位置。来自东欧的进口对就业增长也有负作用(尤其对于低工资部门的就业)。东西移民对工资的增长也有负作用,但在低工资部门的负影响要相对弱一些,这可能是因为最低工资线的缘故。德国却又是另一种情况:东西移民对总就业的增长有正向作用,而对德国籍工人的就业无影响。进口对就业也有促进作用。对于工资的增长,贸易与移民则均无影响。温德埃伯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奥地利的外籍工人与本地工人互相替代,因此移民对本地工人的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而德国的外籍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所以移民对国内就业无负作用。

(三) 欧盟国家移民政策的效应

欧盟国家对移民的控制手段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手段是加强边境管理,直接控制移民的迁入。但这种手段的有效性时常受到质疑。一方面是因为欧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移民接收国与移民输出国在收入上差距悬殊,导致迁移的拉力过大,简单的限制移民并不可能消除工资差异对国际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吸引力。从现实情况来看,左右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是市场的力量,即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而不是制度因素(Tapinos,1994)。接收国移民政策的严厉化,在短期内可能可以遏制移民数量的增加,但长期而言很可能导致非法移民的增长。因此,近年来不少国家更多地求助于间接手段,即将移民问题纳入贸易的框架,希望通过贸易和劳动力流动之间的替代性来缓解移民问题。具体的政策为:增加对南方国家的资本输出,以促进其国内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双边贸易,缩小要素价格的差距,最终达到抑制其居民外流倾向的目的。

根据欧盟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直接的手段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而间接的手段的效果却比较模糊。其原因在于:

第一,同样的贸易政策在不同的国家效果可能大不一样。对于中等收入的移民输出国来说,其出口对贸易成本下降的反应灵敏,实际汇率上升较快,从而导致国内工资水平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已迁移者的回流,也会抑制潜在迁移者的外流倾向,因此贸易与移民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对于低收入的移民输出国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贸易与移民之间更可能是互补关系。

第二,对于低收入的国家的潜在迁移者来说,资金限制是迁移的一个重要约束,双边贸易和外资的增长所带来的国内收入上升,有可能缓解迁移的资金约束,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移民,因此至少在短期内,贸易和移民之间是互补的。

第三,不同层次的迁移者面临不同的迁移约束。假设贸易自由化使南方国家的工资上升,则有可能发生两种情况:对于收入较低的非技术工人而言,工资的上升可能提高其克服迁移成本的障碍的能力,导致更多的迁移行为;对于收入已经比较高的技术工人而言,工资的上升则提高了其迁移的机会成本,因此有可能抑制其迁移的动机。所以,贸易与移民的关系,对于技术工人来说可能是替代,而对于非技术工人来说可能是互补。

第四,资本输出的作用十分有限。首先,政府不能左右私人资本的流动,因而很难保证资本一定流向移民输出国。其次,资本的流动量可能太小,不足以影响移民输出国的宏观经济。再次,私人资本往往流向中等收入国,而不是流向低收入的移民输出国,这与缓解外来移民压力的目标并不完全吻合。

总之,贸易政策的作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贸易自由化(至少在短期内)不一定会导致国际间要素价格的趋同。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产业转移的理论,认为将某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直接雇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或许是另一种缓解发达国家外来移民压力的方法。

三、结论

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以实际情况验证,都不能得出贸易自由化必然导致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的结论。因而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能降低劳动力流动的倾向,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未必能减轻其外来移民增加的压力。相反,贸易成本的下降有可能导致的后果是:(1)扩大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工资差距,增强迁移的动机;(2)弱化移民行为的资金约束,增强迁移的能力;(3)强化生产的集聚性,促使劳动力进一步集中。因此,贸易与移民在长期也许是替代的关系,但在短期内则很可能是互补的。不过,尽管历史数据和现实情况都同H-O理论的预言不尽相同,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H-O理论框架仍不失为解释贸易与移民关系的重要工具。

欧盟国家的对外政策具有不对称性:其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投资政策都远比移民政策开放。对外来移民的限制常常比贸易壁垒的设置更为重要,自由贸易总是走在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之前。在接收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刚性的假设前提

下,外来移民的流入可能会增加接收国的失业率。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假设前提下,外来移民的流入一般并不导致接收国失业率的上升。从短期而言,稀缺要素的流入会增加接收国其他要素的生产率,提高接收国的总体效用。但非技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可能同时从改变本土公民正规部门就业率和拉大要素收入差距两方面影响接收国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从长期来看,外来移民的增加会改变接收国的人口结构,降低其社会资本,对接收国本土公民的效用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无论从移出国还是从接收国的利益考虑,贸易自由化都要优于不受控制的大量移民,因为过量的移民会降低双方社会资本的负面外部效应。正如1995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移民现象通常既有利于移民输出国也有利于移民输入国。不过移民不大可能像贸易和资本那样成为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重要经济桥梁……非技术工人的无节制流动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Banerji A., Campos J. E. and Sabot R. H.,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mal Sector Pay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NBER working paper 1435.
2. Krugman P.,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3. Midelfart - Knarvik K. H, Overman H. G and Venables A. J.,2000,"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eography: Estimating 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EU ", LSE working paper.
4. Muller, T.,1999," Migration, Dual Labour Markets and Social Welfar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 in Faini R., de Melo J. and Zimmermann K. F., Migration: the Controversies and the Evi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Schiff M.,1996," South - North Migration and Trade ",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696.
6. Schiff M.,1998," Trade, Migration and Welfare: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7. Schiff M.,1999,"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Social Capital ",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2222.
8. Tapinos G.,1994," L integration Economique Regionale, Ses Effets sur l'emploi et les Migrations ", in OCDE,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Partnerships for Co-operation, Paris, OCDE.
9. The World Bank,199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Winter - Ebmer R. and Zimmermann K. F.,1999," East - West Trade and Migration: the Austro - German Case ", in Faini R., de Melo J. and Zimmermann K. F., Migration: the Controversies and the Evi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商学院 武汉 430072)

中山大学 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陈永清)